

关于李大钊论历史学性质问题的探析

张文生

(内蒙古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艺术,还是科学?在 20 世纪初期,中国史学家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李大钊很早就开始关注与思考这一史学理论中最基本而且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近代中国,李大钊是对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论述较早,也较为成熟的史学家。李大钊关于历史学特有性质的论述,是他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否认历史学不具有科学性的一些人,往往是从否认历史发展无规律可循立论的。李大钊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论述也是对这一不正确的认识的积极回应。李大钊坚定地指出:“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李大钊在坚持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科学的同时,也承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存在艺术性的工作。历史学研究含有艺术性的工作和历史学是艺术是两回事。历史研究中所体现的这种艺术性是工作层面的事情,并不等同于学科层面。

关键词:李大钊;历史学;学科性质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5-0019-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5.003

An Analysis of Li Dazhao's Views on the Nature of History

ZHANG Wen-s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ians began to discuss the nature of history: whether it is art or science. Very early Li Dazhao began to think about this most basic and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In modern China, Li Dazhao's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cipline nature of history was early and mature. His explanation of the unique nature of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historiography. Those who deny that history is science often argue that there is no law to follow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Therefore, Li Dazhao's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history i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is incorrect understanding. Li Dazhao firmly said: "History is a science, which is no doubt today." Li Dazhao not only adhered to the nature of history, but also admitted that there were artistic works in the process of concrete historical research. That the study of history involves artistic work does not mean that history is an art. The artistr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s just one aspect of historical work, which is not equal to the discipline nature.

Key Words: Li Dazhao; history; nature

关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简称历史学性质)的争论,起自 19 世纪的西方。争论的焦点是历史学性质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一在西方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理论问题,在近代随着西学东渐也引入

中国。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史学界,正值梁启超开启“新史学”之际,中国史学亦踏上近代化的征程。史学如何近代化?怎样近代化?各家各派都在著述立说,阐释或论证各自的主张与学说。自然,历史学的

学科性质问题也成为被关注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在 20 世纪初期,中国史学家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在较早的时候就关注于这一问题,并展开了深入研究,积极参与讨论。李大钊关于历史学特有性质的论述,是他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过去人们对此关注不多,或者在理解上尚不全面。本文就此作一探析,敬请同仁教正。

一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与思考历史学性质这一史学理论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因为这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需要。经过研究,李大钊对于历史学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先让我们引述李大钊的两段相关的集中论述,结合李大钊其他的相关论述作进一步的解读、分析与探讨。

1923 年,李大钊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讲到:“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1]213}

1924 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出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李大钊又对历史学的性质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理论阐述:“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顷,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由第一点去看,可说史学到某程度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由第二点去看,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实在说起来,所谓事实的组成描出,即在他种科学,亦须作此类的工夫到某程度;所以到某程度含有艺术性质的事,亦不独限于史学,即在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亦何尝不然?”^{[2]366}

李大钊对于历史学性质的论述,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同期或稍早的史学家梁启超、

胡适、何炳松等的述论相比要更为详尽,也更为系统。他的论述可以说对于稍后,如张荫麟、刘节等史学家提出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应该说,在近代中国,李大钊是对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论述较早,也较为成熟的史学家,他的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有启发与指导作用,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

二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当时中国史学界,否认历史学不具有科学性的一些人,往往是从否认历史发展无规律可循立论的。在他们看来,历史发展是无规律的,历史研究也不需要更无可能发现规律。既然如此,历史学也就无科学性可言了。也可以说,李大钊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论述,首先是对这一错误的认识或观点的积极而有力的回应。对此,李大钊着力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李大钊把人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称之为法则或理法。“所谓一般的理法,自指存于人事经历的理法而言,非谓于个个特殊事例,常以同一普遍的形态反复出现。”^{[2]371}李大钊坚决反对否认历史发展存在规律的观点,他指出:“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2]370}当然,“在现实个个特殊的时会,种种事情纷纭缠绕,交感互应,实足以妨碍一般的理法以其单纯的形态以为表现”^{[2]371}。这就是说,历史的法则或理法是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之中,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为“种种事情纷纭缠绕,交感互应”,不易发现,这是问题的一面。能否去发现或研究它,这是问题的另一面。换句话说,历史的法则我们能否发现是一回事,去不去发现又是一回事。我们不去发现和研究它,就断然否认历史存在法则、历史存在规律,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和应采取的作法。固然,历史规律的发现较之自然规律的发现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但不能因之而否认历史存在的规律。也不能因之而不去发现历史规律。因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3]466}。当然“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部不能存在”^{[2]370}。这种以“研究困难”来否定历史学成为科学的观点或认识是极不正确的,需要特别地指出并加以克服。

显然,以否定历史发展存在规律,历史学也不需要或不可能去发现规律,来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是不符合实际的。李大钊在他的历史学系统中作了进一步详尽的论述。在这一系统中的普通历史学(广义的历史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记述历史,二是历史理论(狭义的历史学)。普通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人中心构成的各种团体的生活经历。“人类的经历,是一个概括的名称,包括人类在种种范围内团体生活的总合。”这些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团体从小到大,依次是个人的、民族的、社团的、国民的、民族的、人类的。记述历史是对以上各种团体生活的经历,也就是过程的考察和记述,重在“记”。历史理论,它不是去记述那诸般的史实,而“是以一般就种种史的研究其普通的性质及形式,说明一以贯之的理数为目的”^{[2]372},重在“论”。记述历史主要以历史的方法,对历史过程或历史事实记述。也就是记述以人在各种团体中的生活经历,形成各种“经历史”,亦可称作“记经历”。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所研究的对象,原非异物”,是相同的,只是“考察方法”不同。前者主要用逻辑的方法,后者主要用历史的方法。所以,历史理论(狭义的历史学)就种种史实的性质、形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作用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和概括,并通过具体的史实的概括的推论,发现理数,即规律性的东西。“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2]366}只不过就当时历史理论研究的现状,正如李大钊指出的那样:“今观于实际,则治史学者,类多致其全力于记述历史的整理,而于一般史实理论的研究,似尚置之度外;即偶有致力于此者,其成功亦甚微小,以致历史科学尚未充分发展至于成形。”^{[2]371}这也是李大钊致力于历史理论研究的原因所在。

三

在回答了上述质疑后,李大钊坚定地指出:“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史学实为与其他科学同性质同步调的东西。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不过其发达尚在幼稚罢了”^{[2]368}。就此,李大钊从如下两个方面作了进步的论述。

第一,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去发生的历史实

在,它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过去的实在”性。“实在的过去,是死了,去了;过去的事,是做了,完了;过去的人,是一冥长逝,万劫不返了;在他们有任何变动,是永不可能了……过去的人或事的消亡,成就了他们的历史的存在”。譬如孔子,“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为,丝毫不能变动了”^{[2]368}。历史上发生的人人事事,不论你记得也好,不记得也好;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已是一种客观实在。而且这一切又都发生在过去的时间和空间,更是一种过去的客观实在,现今的人们可以研究与评说他们,但决不能改变他们。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如“屈子的骚怨,少陵的悲愤,或寄于文辞,或寓于诗赋,百千万世的后人,只能传诵他们,吟咏他们,不能照原样再作他们”^[4]。这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玩物,是客观的实在。这样就把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置放到坚实的客观基础之上,为历史学成为科学奠定了客观的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历史学成为科学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对于历史学科学性的追求是十分重视的。正像杨鸿烈讲述的那样,“关于史学的‘科学性质’的鉴定很重要的,其情形颇有如《民法》上的‘妻’与‘妾’,‘嫡子’与‘庶子’或‘私生子’等等的‘身份’证明显然有优劣高低差别,所以假如说‘史学’没有成为‘科学’的资格,那么‘史学’就根本没有研究的价值”^[5]。但在总体上,当时对于历史学科学性的鉴定,最初基本上是属于方法的层面。即是把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特别是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的“科学方法”,以及后来把美国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引入史学领域,逐步形成了以西方所谓的“科学方法”与清代乾嘉“朴学”方法相结合为特征的“科学史学”。一部分史学家认为:史学的科学性的实质,就是用这些“科学方法”对史料的批判和史实的实证。重视证据的科学态度,对于克服史学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所存在的缺陷,正如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讲的那样,“在它那工作的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撰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6]。而无法真正从宏观和根本上去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因此,历史学的科学性还需要理论科

学,即有科学理论,特别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史学家当有一种历史观,而且自然的有一种历史观,不过不要采了个偏的、差的历史观罢了”。不然,历史研究“便如迷离飘荡于洋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1]214},更不能够把考订史料、解释史实、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结合起来形成系统论述。而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的是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于研究历史重要的指导作用,就在于:一方面“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另一方面“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7]。从而能够克服“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础”^{[2]357}的缺陷。这就改变了人们过去仅从显赫的政治生活中去解释历史,而未从过去人们不注意的看似平常的经济生活中去解释历史的本末倒置的作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2]541}所以,李大钊指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3]467}

四

李大钊坚持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科学的,同时也承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存在艺术性的工作。对此,李大钊首先是从历史学的任务开始阐述的。历史学的任务通俗地讲,就是复原与描述历史过程与历史现象的,发现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李大钊把它归纳为:一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正的证据;二是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3]280}。“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1]213}历史学的这两大任务都以历史为研究对象,但因完成的任务不同,在研究的过程中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顷,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2]366}也就是说,描述史事与探究法则是统一于历史研究工作过程之中的,不是割裂

的。这是因为历史是人类既往发展的客观过程,其最基本的特点是过逝性。它留给我们的只是各种痕迹、信息与材料,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史料。所以历史上发生的种种史事就是通过历史发展留下的各种痕迹、信息与材料的史料来显现的。但是,史料相对于客观的历史,总是残缺和零散的,而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对种种史事的描述又总是要相对系统与完整,把这些零零总总的“事实结配适宜”,并“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在这一工作过程中,一定有推理和想象的空间存在。冯友兰先生曾讲:“史料多系片段,不相连属,历史家分析史料之后,必继之以综合工作,取此片段史料,运以想象之力,使连为一串。”^[8]同时“事实结配适宜”这一工作的结果最终还要用文字描绘出来,描绘的过程和描绘的本身既需要形象的思维,也需要艺术性的手法与生动的文采。这样才能“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之,这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历史研究的另一个任务是在对历史发展过程与现象的描述与复原的基础上,发现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即在整理与理解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解释历史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发现历史发展的法则或规律。因此,“史学家固不是仅以精查特殊史实而确定之,整理之,即为毕乃能事;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理法”^{[2]367}。历史法则或规律的发现与揭示的过程,就是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所显诸般史实的普遍形式,性质,理法,一般的施以讨论,而抽象的表明之”^{[2]368}这样的研究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遍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2]370}。这一研究工作,如同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一样是科学研究的工作。所以说“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

五

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这种长期争论情况的出现,原因还在于争论的双方缺乏辩正的思维,即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是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于是各持一端。或者因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而忽视其艺术性,或者因肯定其艺术性而否认其科学性。事实上,艺术与科学也并非是绝对对立,水火不容的,而是不可截然分割的。科学始于艺术的想象力,完成于逻辑推理,而艺术始于逻

辑推理,完成于想象力。科学可以让艺术从梦想变为现实,艺术又能使科学插上想象的翅膀。历史学研究含有艺术性的工作和历史学的学科是艺术性是两回事,不能说历史学的研究因为有艺术性质的工作而否认其学科的科学性。李大钊在肯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前提之下,也充分注意到历史学研究工作中的艺术性。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研究所含有的艺术性,并不是仅仅限于过去人们在长期的争论中所讲的,是用艺术性的手法描绘历史研究结果的层面上,还存在于研究过程中的思维层面上。所以,李大钊特别强调:“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但是,历史研究中所体现的这种艺术性它是工作层面的事情,而工作的层面是不等于学科性质层面的。所以说,不能因历史研究工作中含有艺术性的工作,而否认历史学是科学的学科性质。同样,也不能因强调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是科学的,而不承认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有艺术的成分。当然,承认或强调历史研究中的艺术性,要以不损害历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因此,李大钊特别指出,作史者“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情感,毋宁要科学家冷静的头脑”,“即以诗人狂热的情热生动历史的事实,应以不铺张或淹没事实为准”,这是“须有其限度”^{[2]395},决不能突破。这就是历史学与文学等学科本质的区别。

李大钊关于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论述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当时正值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创立时期,类似的一系列的理论问题都需要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作出回答,否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不能立足于中国史坛的。所幸的是,以李

大钊为首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实践道路。我们除敬重他们的精神,更需要研读他们的经典著作,研讨他们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论是成就,还是曲折乃至失误,都是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够割断这一过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去探讨、解析、继承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源与伟大的史学实践,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发展与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与思想资源。这也是本文的所愿。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史学与哲学[M]//李大钊全集:第四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2] 李大钊. 史学要论[M]//李大钊全集:第四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3] 李大钊.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凯尔的历史哲学[M]//李大钊全集:第四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4] 李大钊. 时[M]//李大钊全集:第四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90.
- [5] 杨鸿烈. 史学通论[M]. 商务印书馆,1993:33.
- [6]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49.
- [7] 李大钊.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M]//李大钊全集:第三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539.
- [8]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0.

(责任编辑:夏玉玲)